

和平村

镇远和平村：日俘走上反战路

文 | 刘毓麟

1938年至1944年间，镇远和平村为改造日本战俘发挥了重要作用，先后收容近600名日本俘虏。

2015年，镇远和平村入选“第二批10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、遗址名录”。

和平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国民政府军政部设立的教育、改造日本战俘的第二俘虏收容所的别称，1938年2月创办于湖南常德盐关，主要关押中国南方战场上俘获的日军俘虏。随着战局变化，先迁至湖南辰溪，1938年12月至1944年8月，迁贵州镇远。1944年8月至1946年3月迁重庆巴县直至日俘返回日本。

和平村是军政部直属团职军事机构，其收容所编制为500人（1944年5月镇远和平村造册日俘人数为396人）。原是国民政府贵州省第二模范监狱，占地面积6422平方米，东西宽77米，南北长83.4米，院墙高8米，正门临街，由前院和后院组成，有办公楼、卫兵室、礼堂、岗楼等建筑。

1939年12月25日，在郭沫若、冯乃超（先后任中共第三厅及中共文工会特支书记）指导下，日共旅华反战作家鹿地亘与和平村日俘20余人在广西桂林成立“在华日本人民反战革命同盟会西南支部”。1940年7月20日，在郭、冯指导下，鹿地亘又与和平村日俘10多人在重庆成立“在华日本人民反战革命同盟会总部”。1941年8月，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，军政部长何应钦下令解散总部及支部，并将总

部和支部的50余名盟员押往和平村。

50余名盟员来到和平村后，成立了“在华日本人民反战革命同盟会和平村训练班”，接受鹿地亘及中共党员的教育与指导，系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著作，负责搜集研究日军侵华有关情报，编印反战刊物，团结帮助所内的其他日本战俘认识日军侵华的非正义性，并从事反战工作研究，提供反战宣传资料，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。

训练班在镇远的三年多时间中，主要开展了以下三方面的活动：一是创办日文刊物《呼声》《新日本》，创办日文反战壁报《人民有号角》《人民潮》《人民的战鼓》月刊，揭露日军侵华罪行，呼吁日俘认清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，逐步走上反战之路。二是协助（收容）所方教育改造日俘，消除“圣战”余毒，促其醒悟自新，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教育。三是多次在日俘中组织工作队到抗战前线喊话，对日军进行反战宣传。

1942年6月，经中共党组织派遣，文化工作委员会第三组组员、原驻反战同盟总部联络员康天顺到镇远和平村任中校主任管理员，先后协助代理所长孙必亨、所长莫锦龙搞好管理。他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倡导的“优待俘虏”方针，具体落实优待俘虏政策，关心俘虏生活，注意卫生，搞好

治疗，改善生活条件，进行体育锻炼，进行反战文艺创作，组织盟员学习《论持久战》《改造我们的学习》《整顿党的作风》《反时党八股》等，提高其思想认识，扩大同盟队伍，搜集整理日军情报。

中共镇远支部在成立（1938年12月）后的几年间在和平村也开展了大量的宣传工作，支部书记田伯萍、宋大鸣通过成立的“镇远音乐研究会”、“镇远歌咏队”等公开合法的群众团体，组织进步师生和爱国青年利用联欢会、纪念会和民间传统节日等形式到和平村教日俘学唱中国歌曲，演出抗日戏剧，对日俘进行反对侵略战争的教育和感化教育，促其反思自新，认清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，使其觉醒，部分日俘最后走上了反战之路。

1944年8月，和平村迁往重庆。自1938年至1944年间，镇远和平村为改造日本战俘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和平村通过政策宣传、教育感化和物质生活、精神生活上的关心，使日俘认识到中国军民是真心优待俘虏的，把部分觉悟过来的日本战俘组建成国际性反侵略团体，组成反战统一战线。在和平村中先后收容近600名日本俘虏，其中有反战革命同盟成员150人左右。

（作者单位：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/徐海星）

为适应抗战需要，贵州先后动工兴建了14个机场，除清镇机场属军民两用外，其余13个机场都是为军事服务。《短信